

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

——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

罗家祥

[摘要] 在北宋晚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王韶之子王厚在西北边陲出生入死,立下了显赫战功,但其军事活动及其功绩多被忽略或者否定。王厚之所以能成就功业是与宋王朝的政局演变息息相关的,而要准确定位和评价王厚的军事活动并非易事,除了要考虑在“重文轻武”、百般猜忌和防范武将的宋代,武将尤其是名将要建立功业很难,特别是在北宋覆灭的惨痛现实及由此形成的主流价值观的影响等因素外,还要考虑当时的政局变化。

[关键词] 北宋 晚期 王厚 军事活动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1) 11-0098-09

在北宋哲宗、徽宗统治时期,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云翻雨覆,谲诡百端,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政治局面,最终由所谓的“新党”占据了支配地位。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宋王朝分别在哲宗、徽宗支持下进行的“绍述”并无多少治绩可言,但在西北边陲的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而正是在此期间,宋神宗统治时期以开熙河之役著称的王韶之子王厚在长年征战中出生入死,立下了显赫战功。遗憾的是,由于此后不久北宋覆灭的惨痛现实及由此形成的主流价值观的影响,王厚的军事活动及其功绩基本上被忽略甚至否定,以致直至今日,王厚在西北边陲的诸多事迹也没引起太多的关注。

一、家世与生平

王厚出生于将门之家,其父王韶(1030-1081年),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史载其“第进士,调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1](卷328,P10579)是何原因导致王韶在“试制科不中”后弃文就武,“客游陕西,访采边事”,我们不得其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韶此举为其在此后拓边西北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中立下显赫战功奠定了基础,并使之得以进入了宋代著名将领的行列。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对解决长期困扰北宋王朝的西夏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其略以为:“国家欲制西夏,当复河、湟,河、湟复,则西夏有腹背之忧。自唐乾元以来后,吐蕃陷河陇,至今董氐不能制诸羌,而人自为部,莫想统一,宜以时并有之,以绝夏人之右臂”,提出了制服河湟地区吐蕃诸部落、断西夏右臂的战略构想,从而与宋神宗、王安石恢复汉唐旧疆的志向相契合。

* 本文由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2010AW001)资助。

作者简介 罗家祥,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430074)。

于是“神宗览而奇之，召问方略，以为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①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下，王韶得到了施展平生抱负的机缘。在此后的长年征战中，王韶剿抚并用，先后招服青唐和渭源诸蕃，大破西蕃并降服木征，大败羌族蒙罗角等部，收复了河、宕、岷州，降服了叠、洮州的羌族首领，平定了河湟，取得了北宋王朝开国以来少有的一系列重大胜利。^{[2] (P210-217)}王韶为断西夏右臂而建立的卓越功勋使之官至枢密副使，成为最高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元人编撰的《宋史》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但却对王韶在军事上的建树作出了较为公允的盖棺之论：“韶起孤生，用兵有机略。临出师，召诸将授以指，不复更问，每战必捷。”^{[1] (卷 328, P10582)}给予了王韶极高的评价。

因为王韶在其军旅生涯中所创造的奇迹，人丁兴旺的王氏家族由此也开始飞黄腾达，显赫一方。^②其众多子嗣或因为王韶的功绩和政治地位进入北宋统治集团，成为显宦，或子承父业，走上从军之路，再建奇勋。据有关记载，王韶子王端，徽宗时官至显谏阁待制；子王案“尝著作东观，后为兵部侍郎”。王案子王彦融，南宋时历庐州录事参军、知平江府长州县、无为军通判、知郴州，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九月知楚州，加直敷文阁；第八子王定，“由承务郎除知富川郡事，后以评事致仕”。^{[3] (P50-52)}在王韶诸子中，除王厚“少从父兵间，畅习羌事”^{[1] (卷 328, P10582)}外，从现存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王端曾任兰州通判，也曾与王厚一起效命疆场，经营西北边陲。^③

王厚为王韶次子，字处道，生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九月，卒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享年53岁。^④在王韶有过戎马生涯的子嗣中，王厚在北宋晚期军事史上的战功最为显赫，建树最可称道。他早年因恩荫补官，除大理评事。但他不仅由于自幼跟随王韶出征，对西北吐蕃诸族的情势非常熟悉，而且受到了进士及第的王韶的熏陶，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优秀的品格和良好的素养。这使得他不仅在后来奇迹般地承袭了乃父的军事才能和胆略智慧，而且也传奇般地光大了乃父的奇功伟业。因此《宋史》卷328传论在评述王厚时说：“若厚之降陇拶、瞎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继韶。”的确，王厚经略西北边陲的事迹与功业实为王韶毕生军事活动的拓展和延伸。需要指出的是，王厚之所以能成就功业是与宋王朝的政局演变息息相关的。宋神宗去世后，北宋政局先后出现四次变故。其一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旧党”主政奉行“元祐更化”，全面颠覆“熙丰变法”；其二是宋哲宗亲政后全面颠覆元祐之政，“绍述”神宗政事；其三是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后，宋廷一度试图全面颠覆“绍述”，重施元祐之政；其四是宋徽宗主政之后，对“旧党”实施残酷迫害，再次奉行所谓“绍述”。每当“旧党”在宋廷得势时，王厚便受到排斥与打击；反之，则可重新受到重用。

①王称：《东都事略》卷82《王韶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宋史》卷328《王韶传》载王韶《平戎策》云：“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孙，唯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瞎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耳。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第10579页。

②有关王韶子嗣诸史所载略有不同。《东都事略》卷82《王韶传》称韶有九子；《宋史》本传则称韶“子十人”。

③据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0《收复鄯廓州》载“崇宁三年正月丁酉，王厚奏：‘臣近得弟端书，近往湟州措置招纳，称宗哥城首领结毡将文字遣亲弟结菊来归顺，……臣已丁宁臣弟等更切多方抚谕，速就事功去讫’”，可知王端其时亦在西北参与处置诸蕃事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李之亮点校本，2006年，第2348页；又《全宋文》所载王厚奏徽宗崇宁三年六月《申枢密院功状》中亦有“于是选委通判兰州事王端、将官李忠、王亨等句当招纳”云云。第133册，第37页。

④王厚生年未见之于诸史，但王可喜近年于湖北通山访获民国三十年辛巳重修的《茅田王氏宗谱》，称该谱王厚小传中有确载。“茅田王氏系王韶第八子王定一支，宗谱收录了宋淳熙五年戊戌（1178年）至民国三十年辛巳（1141年）历代十三次续修的序跋题记，完整连续，可信无疑。”（《王厚生卒年考》，《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故采此说。

元祐年间“旧党”否定神宗的“开边”之举，决定弃掉王韶苦心经营的河、湟地区，“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而此时高太后与“旧党”掌控下的宋廷决意全面颠覆神宗之政，王厚受到排斥在情理之中。直到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奉行“绍述”时，王厚才得“用荐者换礼宾副使、干当熙河公事”，^{[1] (卷 328, P10582)} 并先后取得一系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哲宗去世、向太后垂帘听政后，政治局势再一次出现短暂反复，王厚也因所谓“开边”受到政治上的迫害。邹浩在其撰写的贬责王厚的制词中称其“深入青唐，肆蹂族部，私其宝货，祸及无辜，怨结人心，动伤和气”，^{[4] (卷 15)} 将王厚贬为右内府率，此后再贬贺州别驾，^{[1] (卷 328, P10582)} 与之同时，宋廷断然弃掉了元符年间收复的湟、鄯二州。迨徽宗亲政、蔡京主政之后的崇宁年间，宋廷一反向太后主政时所为，重新奉行“绍述”，遂“还厚前秩”，并由童贯监军，命王厚率军重返西北战场。这期间，王厚再次立下显赫战功，并先后以功进威州团练使、熙河经略安抚，超拜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 年），王厚辞世，获赠宁远军节度使。宋廷以其“曩膺选抡，往督西旅，前人是似，于国有劳，品秩寢隆，宠荣未艾，云胡不淑，遽以疾终”，^{[5] (卷 8)} 礼官议谥“恪敏”，而徽宗则“诏以奋忠许国，似其先人”，赐谥“庄敏”。^{[6] (卷 6)}

有关王厚在神宗朝及哲宗元祐年间的军旅生活和事迹，现存文献记载较为简略，《宋史》本传中只用“少从父兵间，畅习羌事，官至通直郎”带过。结合王韶和王厚的生卒年判断，王韶去世时，王厚时年 27 岁，神宗逝世时 31 岁，应该已经具备了丰富的阅历，并已经有所建树。神宗时曾“以王厚言王韶妻独亡不与封故也”而下令“今封三代并妻追封”；^{[7] (卷 30)} “元祐更化”时宋廷弃掉河、湟地区，王厚能够“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均表明在哲宗亲政之前王厚已在宋廷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这也是他在“绍圣初，上方略请经理西事”如愿以偿的原因。^{[6] (卷 6)}

综观王厚一生的戎马生涯和建树，他独挡一面经营西北边陲的时间约为 10 年，即从哲宗亲政的绍圣元年（1094 年）至徽宗崇宁五年之间。在这段时间内，王厚的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当时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也将自己的名将功业推向了顶峰。此外，王厚既洞悉西北情势，骁勇善战，为北宋晚期一名不可多得的战将和统帅，又是一名下笔成文、满腹经纶的儒将。有史料称他“闲居手不释卷，每草诏，拂纸成文，运笔不停，成则一览，不复改窜”，^[3] 有《奏议》30 卷，今不传。

二、元符、崇宁年间两度征战河湟

熙宁年间王韶在宋神宗、王安石鼎力支持下开启的熙河之役，可以说部分地达到了战略目的，^{[8] (P402)} 对吐蕃各部及西夏也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尤其是在开拓疆土方面，熙宁五年（1072 年）十月，北宋设置了熙河路，并先后收复了河、洮、岷等诸州，取得了重大战果。但与之同时，熙河之役也埋下了隐患。王韶虽然在整个战役进行过程中剿抚并用，但本质上均为民族征服，吐蕃诸部以及西夏方面的反弹在所难免。此外，如前所述，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对拓边一事也始终存在着绝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神宗去世之后，宋廷对外政策及所有军事活动实际上成为反映宋廷内部各派政治势力消长沉浮的晴雨表。

（一）哲宗元符年间偕王瞻等攻取邈川、青唐

“元祐更化”时期，实际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重新起用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彻底否定了熙宁、元丰年间所推行的各项“新法”，也彻底否定了宋神宗及王安石试图解除西北边患、恢复汉唐旧疆的战略构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司马光等人标榜以“清静为心，仁惠为政”，一度拟将熙丰年间所获取的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全部疆土和军事重镇弃给西夏。尽管此举遭到一些有识之士和部分将领的坚决反对，但宋廷最终还是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重要军事要塞弃掉，而熙河一路则因安燾、孙路、游师雄等人极力反对放弃才勉强得以保存。当其时，“畅习羌事”的王厚也在反对弃地者之列：“元祐弃河、湟，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然而，司马光、文彦博等人“斥地与敌”、退避忍让的绥靖政策并未奏效，反而产生了“取轻于外夷”的负面效应。整个元祐八年当中，仅就河湟地区而言，北宋与吐蕃之间的局部拉锯战时有发生。宋哲宗亲政之后，随着元祐之政被彻底否定，“绍述”熙丰政事全面展开，宋廷决定重启河湟之役。

关于宋廷决定出师河湟的原因，诸史所载略有差异。《宋史》王赡本传认为，宋廷出师河湟是因为王赡坐事被夺十一官，“欲以功赎过，乃密画取青唐之策，遣客诣章惇言状。惇下其事于孙路，路以为可取。赡遂引兵趣邈川。”^[1](卷 350, P11070)]《京口耆旧传》卷6《王厚传》称：“绍圣初，上方略请经理西事，遂改武阶，不数年，收复鄯、湟。”另有记载则称：“绍圣中，(王厚)干当熙河公事。会瞎征、陇拶争国，河州守将王赡与厚同献议复故地。”^[1](卷 328, P10583)]这些记载似有将北宋出师河湟说成是因个人因素而出现的偶然性事件之嫌。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对出师河湟的原由及过程也有记载，略云：

(元符二年)秋七月，置湟水军。初，吐蕃酋长辖正、隆赞争国，于是绰尔结奔河州，说权知州王赡以取青唐。熙河经略司属官王厚乃与赡同画策，遣客诣章惇。惇下其事于经略使孙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发府库，招徕羌人。……既而河南酋长必斯布结以讲朱、一公、错凿、当剽四城来降。赡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许之。……至是，赡等师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趋邈川。孙路知赡狡狴难制，使总营王愍为将，而以赡副之。故其渡河，赡为前锋，愍策应于后。赡将趋邈川，忌愍分其功，给愍明朝食毕乃发。愍以为诚然。赡夜半忽传发，平明，入邈川。愍徐觉之，整阵而行，日午始至，赡已据府库，舍愍于佛寺。赡径上捷书，不复由帅府矣。……于是，孙路请建为湟水军。路既怒赡，而愍又以赡据府库事诉于路，故路心右愍而夺赡兵权属之。而赡所请，辄又抑不与，专委愍。至河州，又与同还熙河，而留赡屯邈川也。^[9](卷 25)]

综合有关史料、并根据哲宗亲政后的情况判断，王赡、王厚因吐蕃内部出现分裂，利用宋廷“绍述”的有利时机“同献议复故地”，并得到宰相章惇的全力支持，才使宋廷决定重新出师，这应该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王厚同献议的另一重要当事人王赡(?-1101年)，秦州宁远人，也是北宋晚期的一名战将。其父王君萬，追随王韶在对吐蕃诸部的战役中屡立奇功。史载王赡“始因李宪以进。立战功，积官至皇城使，领开州团练使”，元符初任知河州事。他与王厚一样，也畅习羌事。上引《宋史》的文字因各种原因似对王赡有刻意贬损之嫌；而《京口耆旧传》的记载则过分突出了王厚的作用。

北宋在河湟地区的军事活动从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正式展开，至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宋廷政局再变，诏弃鄯州、湟州“以畀吐蕃”，历时近10个月。宋方从一开始攻城掠地即比较顺利，基本上占据主动地位。“邈川，古湟中之地，部属繁庶，形势险要，南拒河州，东拒兰州，皆二百里”，^[9](卷 25)]对北宋与吐蕃双方来说，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宋军于元符二年六月出师。七月，副将王赡领军率先渡过黄河，先下陇朱黑城，顺利攻取邈川。夺取邈川是宋出师后的首战，对以后的战争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此战大捷后，王赡驻军邈川。八月间，吐蕃首领瞎征自青唐脱身来降。吐蕃“宗哥酋舍钦脚求内附，赡遣裨将王咏率五千骑赴之。既入，而诸羌变，咏驰书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1](卷 350, P11071)]王厚的有力配合确保了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瞎征投降宋军后，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之子陇拶入守青唐。九月间，王赡通过激战，占领青唐。宋以青唐为鄯州，以邈川为湟州。元符二年闰九月间，“宰臣章惇率百官上表贺收复青唐，惇等又升殿贺。知枢密院曾布宣答。降授内殿承制、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王厚为东上閤门副使、知湟州，兼陇右沿边同都巡检使。”^[10](卷 516, P12268)]

在北宋此次经略河湟的所有军事活动中，王厚作为主要将领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因绍圣中即充任勾干当熙河公事的王厚与王赡“同献议复故地”，宋廷才正式启动河湟之役；第二，《宋史》称王厚在此次战役中“降陇拶、瞎征”，与事实稍有出入，但他参加了攻取邈川和青唐的所有战事，并因战功得到了宋廷的嘉奖和擢升；第三，在知湟州任上，王厚与王赡、陇拶、赵怀义等一道在安抚招纳吐蕃首领、构筑城寨以及维护边境稳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①第四，宋军占领鄯州、湟州之后，王厚担任

^①参见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6之后6，第7836页；《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壬戌条亦有“诏王厚同王赡管勾青唐招纳事”；《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乙亥条载枢密院“仍仰王赡、王厚更互出入巡警，务令人情安帖”云云，第12249、12271页。

知湟州事，负责管辖和治理湟州，直到哲宗去世后宋廷弃掉鄯、湟才离开此地。

（二）徽宗“绍述”，王厚再度收复湟、鄯、廓州

哲宗去世后，“元祐更化”的历史重演，绍圣、元符间开边的将领再次受到排斥与打击。在向太后在权同听政的一年多时间内，宋廷因姚雄论奏王贍、王厚涉嫌贪污府库财物，于元符三年五月，窜王贍于房州，“越明年三月，流贍昌化军，至邓州缢死。王厚郴州安置”。^{[9]（卷 25）}姚雄主要是为了报复王贍，但却正好满足了“旧党”官员的政治需要，王厚也因之受到打击。建中靖国元年下半年徽宗亲政后，拟改次年为崇宁元年，“绍述”又死而复活。

与哲宗亲政时的“绍述”有所不同，徽宗亲政伊始即考虑用兵河湟，收复元符末年弃掉的鄯、湟等州。以资历、战功、才能及对河湟地区的熟悉程度论，王厚当然是率军出征的不二人选。有意思的是，王厚因被遴选为统帅一事与北宋晚期政治史上声名狼藉的几个人物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史载：

立措置边事司，以王厚及内侍童贯领之。上留意西边，尝问知枢密院蔡卞：“鄯、湟可复否？”曰：“可。”问：“谁可将？”曰：“王厚可为大将，高永年可统兵。”是春，乃以厚为洮西安抚、知河州，令措置招纳。寻令权熙河兰会经略永年为统制官。蔡京又言，童贯顷十使陕西，审五路利害与诸将之能否为甚，大力荐之。遂用李宪故事，命贯为监军，专切往来干当。至是，置司，专命二人主之。

赵挺之云，蔡京每以复湟、鄯启迪上，上意向之，京亦知缘边之粮兵未可动，乃劝上多出金帛官爵，厚诱其酋首来降。挺之谓京初不习西事本末，妄以为湟、鄯诸羌亦如沅辰邵之溪洞，贪利畏威，相率归顺。又以为大隆赞既尝至中国，可指呼而用之，不知其大隆赞已据有河南地，岂复肯归汉为匹夫。而都尔伯朗阿克章方为小隆赞谋主，皆不可致，但得其地近汉蕃挨五七人或十数人出汉，乞以白旗立要约，名为招纳而已。然所给散朝廷之金已不可胜计，卒致用兵云。^{[9]（卷 26）}

其他记载与上述大同小异。亲政之始，宋徽宗对收复河湟有兴趣，需要找到不辱使命的合适人选；蔡京、蔡卞兄弟虽然“同而不和”，但对任命王厚为大将的看法完全一致；宋廷在王厚出征时需派出监军防范和伺察，童贯对此职兴趣最大；蔡京在钱塘时即与童贯暗通款曲，对童贯怀有感恩之心，因而投桃报李，极力推荐童贯。因为上述各种犬牙交错的奇特关系，却意外地促成王厚与北宋末年著名的“六贼”之一的童贯成为同僚，并最终成功收复河湟，成就了一代名将的功业。

1. 成功收复湟州。徽宗崇宁元年（1102 年）十二月，宋廷在政治上为开边将领平反昭雪，重新任命王厚、高永年为帅。崇宁二年正月，东上閤门副使、新知岷州王厚权发遣河州，兼洮西沿边安抚司公事。三月，王厚率十余万大军进入熙州。六月，王厚正式攻打湟州。战前，王厚进行了周密部署。他说服监军童贯，决定兵分两路夹击湟州。一路由王厚、童贯亲率大军，出安乡关，渡过黄河，直取巴金岭；另一路则由岷州守将高永年为统制官，与权知兰州姚师闵、管勾招纳王厚之弟王端并率兰、岷二州及通远军兵马 2 万出京玉关。而此时，吐蕃“多罗巴奉怀德之弟溪赊罗撒谋复国，（赵）怀德畏逼，奔河南，种落更挟之以令诸部。朝廷患众羌扇结，命厚安抚洮西，遣内客省使童贯偕往。多罗巴知王师且至，集众以拒。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羌备益弛，乃与偏将高永年异道出。多罗巴三子以数万人分据险，厚进击破杀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罗巴，与俱遁。遂拔湟州”。王厚以功进威州团练使、熙河经略安抚。^①

湟州一战，王厚战术运用得当，将士勇猛拼杀，这是宋军迅速得手的主要原因。吐蕃多罗巴得知宋兵前来征讨时，也做好了充分准备，但由于王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致多罗巴因有险可守而产生麻痹心理。与之同时，王厚与高永年则出其不意，分兵合击，顺利攻占了湟州。宋军致胜的另一原因，

^① 《宋史》卷 328《王韶传》所附《王厚传》，第 10583 页；又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39 对此有更详细记载。

则是王厚对湟州的地理形胜和吐蕃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并充分利用了元符间知湟州时留下的政治影响。这从攻打湟州之前王厚在给朝廷的一封奏状中可以清楚看到：

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至熙州，体问得元符弃地之后，诸羌因我城垒，聚粮整备，结集兵众，以为固守之计。又湟州境内巴、金、乧当、把拶宗等处形势险阨，自来羌人负以为固，有一夫当之、万众莫前之说。议者因此多言湟、鄯难复，得亦难守。然厚久已详察羌情状，分离不一，互相窥视，必不能并力同心，保有其地。若奉扬国威，示以恩信，必能瓦解来降，其违命者亦不过一二族，则皆破胆矣。厚先在湟州日，镇抚境内，颇见畏怀，闻厚复来领帅，各已欣赖，间通信息，愿为中国用者甚众。^{[11]（卷 2864,P36-37）}

由王厚此疏可知，尽管“湟州境内巴、金、乧当、把拶宗等处形势险阨”，有“一夫当之、万众莫前之说”，但王厚在战前即有如成竹在胸，故能指挥若定，奋勇拼杀，一举攻克。在其戎马生涯中，此战可以说是王厚最经典的战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一代名将的卓越风采。

纯粹从军事角度看，湟州之役的战果无疑是巨大的。一是收复了湟州并管下城寨周围边面地里，共约 1500 余里，东至黄河、兰州京玉关，西至省章峡、宗奇界，次西至廓州黄河界，南至河州界，北至夏国盖朱界；二是收复了湟州并管下城寨 10 所，即通川堡、通湟寨、省章寨、峡口堡、安陇寨、宁洮寨、乧当城、宁川堡、南宗堡，获得了众多军事要塞；三是招纳湟州管下大首领滕令等 21 族，户口约 10 余万计；大首领令奘行等 50 余人，小首领把班等 400 余人。“湟州一境土壤膏腴，实宜寂麦，控临西夏，制其死命。前世所欲必复之地，今仍一举得之。”^{[11]（卷 2864,P31）}消息传到北宋京城开封，朝野一片狂欢。

2. 成功收复鄯州、廓州。湟州大捷后，王厚率大军驻扎湟州，部署攻讨鄯州（青唐）和廓州事宜。王厚攻打和收复鄯、廓州所采取的策略，仍是剿抚并用。

崇宁三年三月，监军童贯自开封抵熙州，鄯州、廓州之役正式启动。随即，王厚与童贯率大军由筛金平出发，直奔鄯州。在进军途中，“陇右都护高永年为统制，诸路蕃、汉兵随行；知兰州张诚为同统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不测，于兰、湟州界侵扰，及河南蕃贼，亦乘虚窃发，骚动新边，牵制军势，乃遣知通远军潘逢权领湟州，知会州姚师闵权领兰州，照管夏国边面；另遣河州刘仲武统制兵将驻安强寨，因而兴筑甘朴堡，通南川、安强、大通往来道路。于是本路家计完密，无后顾之忧，大军得到专力西向。”^{[12]（卷 140,P2349）}四月间，王厚“命（高）永年将左军循宗水而北，别将张诚将右军出宗谷而南，自将中军趋绥远，期会宗哥川”。^{[1]（卷 238,P10583）}有关攻克鄯州的细节，《宋史》王厚本传有生动记载：

羌置阵临宗水，倚北山，溪谿罗撒张黄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军旗鼓争赴之。厚麾游骑登山攻其背，亲帅强弩迎射，羌退走。右军济水击之，大风从东南来，扬沙翳羌目，不得视，遂大败，斩首四千三百余级，俘三千余人。罗撒以一骑驰去，其母龟兹公主与诸酋开鄯州降。厚计罗撒必且走青唐，将夜追之，童贯以为不能及，遂止。

王厚攻克鄯州之后，宋军一路势如破竹，顺势在几天之内攻下了廓州，“酋落施军令结以众降”，宋军再次获得大捷，“拓疆幅万余里”。^{[11]（卷 2864,P35）}

3. 对收复地区的治理。王厚是一位杰出的统帅和军事家，同时也有较深远的政治眼光。对于如何管理新收复地区，他有着系统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

为防止吐蕃诸族归顺后反叛，导致新的动乱，巩固和稳定所收复地区，王厚有着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据王厚崇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所上奏状称，攻取湟州后，他自己回军河州措置事务，但“仍每月一次轮差将官领千余骑，附十余日粮，前去湟州及临宗、绥远、来宾一带巡绰。照管抚存新归部族讫，即回本驻扎处”，^{[11]（卷 2864,P34）}以防不测。

在如何治理所收复地区问题上，王厚也有至为周详的考虑。从他关于治理鄯、廓二州的想法和做法可见一斑：对原有居住人户，“田土依旧为主，秋毫不得侵占”；对于“与官军抗敌杀逐心黑之人，所营田土并元系西蕃王子董毡、瞎征、温溪心等田土，顷亩不少。已指挥逐州尽行拘收入官，拨创置弓箭

手，应付边备，可省戍兵经久岁费，为利甚博”；招募弓箭手“与新附诸羌杂居，伺察羌人情”，使之“不敢作过”，并“令逐州如有情愿投刺之人，一面招置，听候朝廷指挥。仍将已种到青苗，就便播充为种粮去讫”。^{[11] (卷 2864, P35)} 显然，王厚对收复地区的治理是有其长远考虑的。

此外，对收复地区归属不甚明了的所在，王厚还建议朝廷或增设新的行政建制，或使之归入临近州军进行管理。如崇宁二年，王厚收复通川堡、南宗堡、峡口堡后，上奏将其纳入湟州管辖。^{[1] (卷 87, P2168)} 同年，王厚上奏“溪哥城乃古积石军，今当为州”，请求“以李忠为守，置河南安抚司”，得到宋廷的同意而付诸实施。^{[1] (卷 167, P3961)} 又“乞以通远军依旧为渭州，升为节镇，并乞改差文臣知州。仍乞自朝廷选除”。^{[13] (P7405)} 打下鄯州后，根据王厚的建议，将其“更名曰西平，建为陇右都护府”。^{[9] (卷 27)} 同时根据军事需要，在一些战略要地新筑了一批城堡。如震武城即是此时新筑的，不久升为军。经过王厚对收复地区的重新规划与治理，“至是唃廝罗之地悉为郡县矣”。^{[9] (卷 28)}

王厚此次出师河湟，北宋政府耗费了较大的财力，据说是“费钱亿万，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费钱一千二十四万九千余缗”。^{[1] (卷 175, P4247)} 但撇开其他因素不论，毫无疑问，经过王厚在徽宗崇宁间的征战与开拓，史称共收复湟、鄯、廓三州二十余垒，“自崇宁以来，……凡所建州、军、关、城、砦、堡，纷然莫可胜纪。”^{[1] (卷 85, P2096)} 北宋王朝的版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所花费的代价应该说是值得的。

综上所述，王厚于北宋哲宗元符年间、徽宗崇宁年间两次出征河湟地区，均立下了显赫战功。尤其是在崇宁年间统率大军再次经略河湟期间，王厚不仅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卓越建树和军事艺术，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治理边疆地区的政治智慧。

三、王厚的历史地位

要准确定位和评价王厚在北宋晚期的军事活动并非易事。其所以然，是因为至少如下方面需要首先釐清：其一，在宋人的词典里，“拓边”是贬义词，且王厚去世 20 年后北宋王朝即告覆灭，必须说明王厚的军事活动与“靖康之难”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其二，王厚虽然经营西北卓有成效，但这一地区不久便落入金人之手，其意义又何在；其三，王厚征战河湟实际上是哲宗、徽宗“绍述”的重要内容，如何将王厚军事活动的性质与“绍述”的性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其四，如何估价北宋“重文抑武”的传统国策以及北宋晚期众多负面历史人物对王厚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给评价王厚带来了困难。

宋室南渡之后，“靖康之难”的成因是南宋朝野痛中思痛的重要内容，由于诸如两宋之际杨时之流的官员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复杂作用，南宋朝野将蔡京等人的胡作非为简单等同于王安石变法，从而得出了北宋之所以覆灭的似是而非的答案，因而王厚多年征战西北边陲的功业不仅未能得到南宋君臣的认同，反而与祸国殃民等同，^① 于是，一代名将王厚的风采也渐渐被历史尘封，甚至被歪曲和否定。笔者以为，对王厚个人而言，这是有欠公允的。

在“重文轻武”、百般猜忌和防范武将的宋代，武将、尤其是名将要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异常艰难。王夫之说得明白：“自赵普献猜防之谋，立国百余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杰为苞桑之术。则分阃临戎者，固以容身为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祸。故平方腊，取熙河，非童贯以奄宦无猜，不敢尸战胜之功。”^{[14] (卷 8, P151)} 此言不虚。如何对待武将，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们始终怀有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在外患频仍、国步维艰之时，他们渴望有良将再世，扶大厦之将倾；另一方面，当战事平息、暂时获得喘息之后，他们又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取而代之，因而视之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些参透

^①如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 14《兵费》：“绍圣遂乘势取讨，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陕西河东建州一、军二、关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崇宁始任童贯、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余垒，陶即夫、钟传、邢恕、胡宗、曾孝序之徒，凿空驾虚驰鹜乎元符封域之表。迄于宣和，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虽西事粗定，北事踵起。最后建燕山、云中两路，甫及五岁，祸乱遽作，中原板荡，故疆沦丧矣。”宋人基本上是将王厚在北宋晚期的军事活动作为北宋亡国的因果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来看待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重文抑武”玄机的士大夫们同样动辄对武将深文周纳，落井下石；甚至一些武将为达到其目的也心怀叵测，乐此不疲。这就是一代名将王厚建功立业的生存环境。

除此之外，王厚还得承受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残酷剧烈的朋党之争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司马光等人实施“元祐更化”导致了北宋后期政治舞台上“党争”绵延不绝，这一时期的武将也难以幸免。武将虽能在腥风血雨中建立不朽功勋，但也随时会成为党同伐异的牺牲品，遭到清算与打击。徽宗即位、向太后“权同听政”时，宋廷对王贍、王厚的打击即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元符三年）五月，窜王贍于房州。姚雄奏称：青唐、邈川，始因王贍贪功生事。招携羌酋，收复穷远之地，费财劳师，连岁不解，几陷两路军马，烦朝廷遣兵救应，仅能全师而还。枢密院勘会王贍前后傲慢专辄，情实难恕。兼累据臣僚奏王贍、王厚自据青唐、邈川，其拣戡辖正珍宝及府库钱物，并不实时起置文历；森摩钦哉等九人既已处置，其逐家财产亦不见下落。以此显见二人各有侵盗，迹状分明。缘事干人众，更不欲置狱推究。乞贬贍及厚，仍告谕将士，咸使知之。故有是命。越明年三月，流贍昌化军，至邓州缢死；王厚郴州安置。^{[9]（卷 25）}

有史料表明，姚雄论奏王贍、王厚另有原因，但他却趁向太后“权同听政”、旧党复起之机，以不实之辞成功除掉了王贍与王厚，致同为晚宋名将的王贍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免真决不刺面，配昌化军牢城，永不放还”，在受尽凌辱之后惨死。而王厚则先被贬为右内府库，后又贬为贺州别驾，郴州安置。^①迨崇宁初政局再变时，宋廷则又马上给王贍、王厚平反昭雪，痛贬向太后垂帘时主张弃地的龚夫、张庭坚、韩忠彦、曾布、安燾、蒋之奇、范纯礼等人。^{[13]（P7838）}北宋晚期武将生存环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但作者认为，北宋王朝“重文抑武”的阴暗心理和北宋晚期党同伐异的政治气氛或许未能让王厚在历史舞台上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但难以磨灭其作为一代名将的风采，也难以淹没王厚在宋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如果纯粹从军事才能、军事素质来看，我们说王厚是北宋晚期最优秀的将领和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其名将风范至少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王厚在战场上骁勇善战，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具有一位名将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品格。王厚早年随父出征是如此，哲宗元符年间与王贍等分别率兵征讨河湟是如此。徽宗崇宁年间，王厚已是十余万大军的统帅，在战场上仍然是如此，如在攻打鄱州时他就“亲帅强弩迎射”，使此战取得胜利。

其次，王厚在出师征战前对诸多影响战争结果的重大因素深思熟虑，在战争进程中多谋善断，智勇双全，具有名副其实的大将风范。徽宗崇宁年间王厚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战绩，有多重因素起作用，但他能争取到战场上相对独立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出师之前，王厚援引熙宁间王韶获得神宗信任为例，要求“今朝廷措置一方边事，已究见利害本末。欲乞自今中外臣僚言涉青唐利害者，乞依熙宁故事，并付本路经略司及所委措置官看详”，并得到宋廷认可。^{[12]（卷 139，P2328）}王厚也深知宋廷防范武将的阴暗心理，但为了战争胜利，他能说服宋徽宗网开一面，这对整个战争进程和战争结果影响甚大。在战争中，王厚与另一重要将领王贍嗜杀有所不同，他深受父亲王韶的影响，继承了剿抚并用的方略，尽量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所谓“能以恩信结戎心，不事杀戮”，^{[6]（卷 6）}他认为“恢复故地，当以恩信招纳为本，俟其顽悖不服，乃加诛”。^{[12]（卷 139，P2327-2328）}这些想法不仅充分说明王厚高超的军事才能，也反映出他过人的政治智慧。

第三，王厚能审时度势，善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达到最终在战争中取胜的战略目的。前已述及，北宋晚期武将的生存环境异常险恶，但王厚能通过其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化解不利因素，终将其名

^①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 6 之 40 对此案记录甚为详细，第 7838 页。另《宋史》王厚本传称“既而他种叛，合兵来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界怀德，而贬厚右内府率，再贬贺州别驾”。此段文字未谈姚雄罗织一事，明言当时宋廷弃地之后贬开边之臣，这是接近事实的。参见《宋史》卷 328《王韶传》所附《王厚传》，第 10583 页。

将事业推向顶峰。在如上所述的险恶政治环境中，王厚在西北的军事活动能得到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支持与肯定，这是极其不易的。蔡卞并非所谓奸臣，具有出众的政治才干，他对王厚的青睐和赏识在情理之中。但要做到与监军相安无事，确保出师致胜，在宋代历史上并没有多少成功的先例，而王厚却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知道童贯与王厚有何特殊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王厚经营河湟期间，“童贯自京师还，至熙州，凡所措置，与王厚皆不异”，^{[12]（卷 140,P2349）}后来涉及一些重大问题时，也能采纳王厚的意见，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王厚自身所拥有的卓越军事才能和非凡人格魅力来解释。

第四，王厚光明磊落，为人坦荡，善于与同僚相处。同献议取青唐的王赡，也是北宋晚期不可多得的将才之一，但史称其“狡狴难制”，贪功冒赏，狂妄自大，嗜杀无度，以致“青唐诸羌服后又叛，怨入骨髓”，屡为同僚所忌，经略使孙路、总营王愬、姚雄等人均与之有隙。王赡最后不堪侮辱自缢身亡，这一悲剧结局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也与王赡自己的为人处事有关。但是，王厚却能与之相安无事，他们能够在战争中配合默契，生死与共。北宋后期政治与军政日趋腐败，贪赃枉法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元符二年三月，因“妄增首级，冒受功赏，兼虚上首级与使臣、亲戚”，熙河兰会路经略判官钟传等数十名文武官员受到严厉处罚，其中众多官员被除名勒停编管，时任熙河路经略司勾当公事、礼宾副使的王厚也牵连其中，但只受到降一官的轻微处分，^{[10]（卷 507,P12085-12086）}结合北宋晚期的特殊政治气氛和官场陋习，这是耐人寻味的。此外，王厚在其军事活动中善于用人，人尽其才，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也是一大特色。如建州崇安人刘鞬，“绍圣中，王厚镇熙州，辟为狄道令，提举陕西平货司。河湟兵屯多，食不继，鞬延致酋长，出金帛易粟以饷军，公私便之。遂为转运使。初，熙河郡常贡毛褐段，厚于例外增以遗朝贵，鞬曰勿重困百姓，厚从之。”王厚的包容与豁达使刘鞬在战争中屡建奇功，^{[15]（卷 31）}从而也促成了王厚的巨大成功。

[参考文献]

- [1]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参见邓广铭. 邓广铭全集（第1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 [3] 参见王娇，王可喜. 新发现《茅田王氏宗谱》所存冯京等宋人佚诗文辑考 [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2）.
- [4] 邹浩. 道乡集·王厚责授贺州别驾制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 慕容彦远. 摘文堂集·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厚可赠节度使制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无名氏. 京口耆旧传·王厚传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 参见彭百川. 太平治迹统类·官制沿革下 [Z].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 参见李华瑞. 宋夏关系史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9] 陈均. 九朝编年备要·哲宗皇帝 [Z].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Z].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1] 全宋文（第13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12] 杨仲良.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Z]. 李之亮点校.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13] 徐松. 宋会要辑稿（第8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4] 王夫之. 宋论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5] 甘肃通志·名宦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杨向艳